

中华文明宝库

JIAN ZHEN DONG DU

鉴真
东渡

王东 陈鹏鸣 著

B949.92

W31

中华文明宝库

鉴真东渡

王东 陈鹏鸣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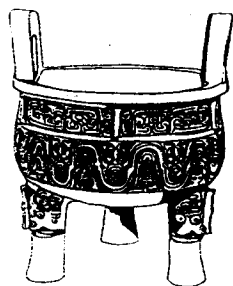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375 插页 4 字数 71,000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 7-5325-2163-X

G·92 定价:8.60元



引 言

中日两国,地理上一衣带水,文化上脉络相通。历史上两国之间虽然时有战争,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友好交往的时间居多。唐代的鉴真和尚,便是这种友好交往的著名使者。他以惊人的毅力,在不幸双眼失明的情况下,历经十二年的苦难,九死一生,方才完成东渡弘法、传播佛教的夙愿。虽然他为此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但却赢得了中日两国人民的世代景仰。鉴真是位才华卓著的僧人,在中国时,他便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高僧。到了日本以后,又将盛唐文化传播到了那里,在佛学、美术、雕塑、建筑、医药等方面,深刻地影响了日本文化的发展,为日本天平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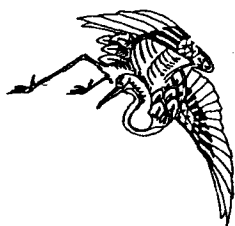
鉴真东渡留给我们的是一笔宝贵的遗产,他在中日两国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虽然,在进入近代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数次侵华战争,给两国人民,尤其是中国人

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影响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但是，即使在战争时期，中日两国都有一些不抱偏见的人们，默默地以自己的实际工作，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添砖加瓦。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开始，两国的传统友谊又得到新的发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又在四处漫游，有些极右分子公然篡改历史，美化日本侵华战争，否定“南京大屠杀”，甚至有些政界要人，不顾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参拜供奉着法西斯分子的靖国神社，对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犯顶礼膜拜，这不能不引起珍视两国传统友谊的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不忘记历史，才能使我们更加珍惜现在得之不易的友谊，才能更好地促进两国人民友谊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今天纪念鉴真，不能陶醉于盛唐文化所给予世界文化的贡献，而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当前与发达国家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还需要我们不断地向外国先进文化学习。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永远不吸收外国文化，即使在盛唐时期，中国也从不排斥外来文化，当时的许多领域都吸收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文化，可以说，越是国家强盛的时候，越是不排斥外来文化。

鉴真大师圆寂已有一千二百多年了。当我们在扬州鉴真纪念馆里，或是在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里，看到鉴真遗像那安详的微笑时，一定能感受到大师那菩萨般的心肠，钢铁般的意志……那就让我们追随着大师的脚印，考察他那充满传奇色彩的东渡弘法的历程吧。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这本小册子的写作，参考了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表示真诚的谢意。



一、求佛法日僧访名寺 弘教义鉴真赴东瀛

1. 日僧来访

大唐王朝天宝元年(742),金秋10月。江淮名城扬州。

座落在扬州城北郊蜀岗中峰的大明寺(清代改称法净寺),古木葱茏,丹桂飘香。

寺外,香客成群结队,鱼贯而入,喧闹非常。

寺内,香烟缭绕,烛光明灭,诵经声、祈祷声不绝于耳。

住持禅房,鉴真和尚手捻佛珠,口诵经文,双目微闭,物我两忘。

俄顷,僧童来报,外面有几位行僧求见大和尚,随即向住持递上一纸书信。

看罢书信，鉴真方才得知，原来是自己的弟子道航和尚，领着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的几位留学僧人，前来拜访。

待客人一一进入住持禅房，稍事寒暄之后，道航把几位日本学僧详细介绍给鉴真。他们分别是开元二十一年(733)4月随第九次遣唐使来大唐留学的荣睿、普照，以及先期而来的玄朗、玄法等人。

荣睿、普照一行的到来，使鉴真感到格外高兴。早在他游历西京长安(今陕西西安)和东都洛阳(今属河南)时，就曾和日本的留学僧有过交往，对佛法在日本的传播情况，也有所了解。他还曾听说过这样一段中日两国佛学交流史上的佳话：日本左大臣长屋王当政时期，崇敬佛法，曾缝制袈裟千件，送到大唐，分施给大德众僧；在这千件袈裟之上，还绣上了长屋王亲自题写的四句偈语——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表达了与中国结缘，同兴佛法的真诚愿望。像鉴真这样一位献身于佛教事业的虔诚教徒，对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能在异国他乡开花结果，发扬光大，当然感到十分欣慰。正因为如此，荣睿、普照一行的来访，使鉴真觉得又可以与有缘之国的同行切磋法义，相互交流，从而感到十分高兴。

只是，出乎鉴真意料的是，荣睿、普照一行的此次来访，不只是一要向鉴真问学究法，而且还肩负着一项特殊的使命——邀请鉴真东渡日本，设坛授戒，弘扬佛法。他们为什么要邀请鉴真东渡日本？这得先从鉴真这位一代佛学大师说起。

2. 名寺高僧

武周垂拱四年(688),鉴真诞生在江阳县(在今扬州市)一个姓淳于的商人家庭。他的故乡扬州,地处江淮之间的长江三角洲中心,北邻黄河下游的中原大平原。自战国末期楚怀王在这里建城起,中经秦、汉两代经营,扬州历来是东南重地,一方名城。东晋南渡以后,中原人民大批南迁,这里更是人烟稠密,经济繁荣,文化昌明。特别是隋代的大运河凿通后,扬州不仅成为东南水陆交通的枢纽;而且还是黄河以南以及东南沿海一带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到了鉴真生活的唐代,前有“贞观之治”,后有“开元盛世”,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了高峰状态。作为一方重镇的扬州,此时更是繁华富庶,以至当时就有“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之说;史书上也有关于“广陵当南北大街,百货所集”的记载(《唐会要》卷八十六)。

就是在扬州这样一个繁荣昌盛的大都会环境中,鉴真度过了他的童年。他的父亲是一个商人,却笃信佛教,曾在扬州的大云寺随智满禅师受戒。每每于行商之余,携带童年的鉴真,游历佛寺,烧香许愿,祈祷来福。家庭的宗教熏陶,使得年幼的鉴真,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古柏掩映的寺院,香烟缭绕的经堂,和善慈祥的佛像,超然入定的僧侣,还有那雄浑的梵钟,清脆的木鱼……所有这一切,都在他幼小的心田里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鉴真的童年时代,佛教作为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受到上层当政者的大力提倡。鉴真出生的第二年,女皇武则天临朝称帝,大兴佛法,号令天下各州,各建一座寺院。自六朝以来一直

作为东南佛教中心之一的扬州，此时更是寺院林立，教派纷呈，名师荟萃。鉴真时代扬州诸寺院中，有确切史料可以稽考其名称者，就有大云寺、龙兴别院、大明寺、光山寺、上方寺、既济寺等 20 处（孙蔚民：《鉴真东渡记》）。加上规模较小，寺名已无载籍可考者，当倍于此数。日本留学僧圆仁曾指出，唐代的扬州，“有四十余寺”（《入唐求法巡礼记》）。当时佛教之盛，由此可以想见。

在家庭环境和社会氛围的双重影响下，少年时代的鉴真，就选择了一条与当时一般人家子弟截然不同的人生之路。在唐代，由于科举制度的确立，一般人家的子弟，都以应试科举、博取功名为人生标的，以至于唐太宗也有“天下英雄，尽入彀中”的感叹。就在天下“英雄”为跻身仕途，而在科举考试这条独木舟上奋力搏击之时，14 岁的鉴真，却在武则天长安元年（701），进入了他父亲也曾在那里受戒的大云寺，跟随曾为他父亲主持受戒仪式的智满禅师，开始了献身佛法、普渡众生的生涯。

进入大云寺不久，也是在智满禅师的主持下，鉴真剃发为沙弥。这位为鉴真父子主持过受戒仪式的智满和尚，在当时的佛学界可谓一代宗师。据史籍记载，武则天临朝称帝后，曾诏令“天下诸州度僧，便就智满禅师”（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以下简称《东征传》）。在这位名师的指点下，鉴真醉心法义，驰骋佛典，为他后来成为一代佛学大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大云寺的晨钟暮鼓之中，鉴真由少年进入了人生中最弥足珍贵的青年时代。神龙元年（705），他又从道岸律师受菩萨戒。所谓菩萨戒，也就是佛教大乘派菩萨僧必须遵循的行止戒律。依照《梵网经》的解释，这些戒律共包括 10 项重禁和 48

条轻戒；而按《善戒经》的规定，则共有“二百五十戒”。其主要内容有戒杀生、戒偷盗、戒邪淫、戒妄语、戒饮酒等等。与上文提到的智满一样，为鉴真主持菩萨戒授受仪式的道岸，也是当时佛学界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师。据《宋高僧传》记载，道岸是唐代“南山律宗”的开宗鼻祖道宣的弟子，曾与玄奘大师一道同场译经，为佛教在社会各阶层的传播和普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不但精通佛理，而且能说善辩，在教徒之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据说在听了他的讲经之后，“高僧大士，心醉神倾，捐弃旧闻，佩服新义，江介一变，其道大行”（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四），以至当朝皇帝中宗李显也钦佩不已，特派专使请他到长安去讲经布道。正是在道岸律师的影响下，鉴真遍览律宗经典，在律学的研究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在受完菩萨戒后不久，鉴真前往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在这里，他历访丛林，结缘名僧，对中国佛教的发展情况，有了详细的了解，对当时各大教派的教旨教规，也有了较深的体认。景龙二年（708）3月，在长安的实际寺，鉴真从当时另一位名僧荆州玉泉寺的弘景禅师受具足戒。所谓具足戒，又称大戒，根据律宗经典《四分律》的规定，具足戒中关于比丘（和尚）有250条戒律，关于比丘尼（尼姑）有500条戒律。与菩萨戒不同的是，具足戒注重的是僧侣的内在心性自律，而菩萨戒强调的是对僧侣外在行止的约束。在佛教界，具足戒是僧侣的最高戒律，所谓具足，也就是各种修行的戒条均已十足完备之意。授受具足戒时，要有三师七证，仪式十分隆重。在鉴真的受具足戒仪式中，主持授戒者为弘景禅师，担任“七证”中见证师者为道宣的付法弟子文纲，此外，还有当年为其主持受菩萨戒的道岸以及颇为当时佛教界推崇的法藏等十余位名师。由此可见，

鉴真这位年仅 20 岁的佛门后起之秀，已得到了当时佛教各派大师的推许和器重。

在这以后，鉴真又先后从济融律师习《南山律钞》、《业疏》和《轻重仪》；从义威律师听讲法砺律师的《四分律疏》；从远智律师听讲《律疏》。上述各位律师，都是当时律宗各派的代表人物。为了究明律宗经典的奥理，鉴真又在长安听观音寺大亮律师再讲《疏》五遍；在洛阳授记寺听金修律师和慧策律师各讲《律疏》一遍。在这些名师的讲授指点下，鉴真旁参佛典，驰骋各派，潜心研几，外秉威仪，内求奥理，具修三学，博达五乘，遂成为一名自能开宗立派的学僧。

开元元年(713)，26 岁的鉴真回到了故里扬州。此后 30 年间，他一直在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一带传道弘法。据《东征传》记载，在这期间，鉴真曾前后讲授律宗“大律”和义疏 40 道，宣讲《律钞》70 遍，讲《轻重仪》和《羯磨疏》各 10 通。在讲经传道的同时，他还亲自登坛授戒，先后度 4 万余人。在他的诸多弟子中，著名的就有 30 多人。如长安安国寺的璇光，扬州兴云寺的惠琮，江州大林寺的志恩，苏州开元寺的辩秀，天台国清寺的法云等，后来都成为名重一方的高僧。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学理传四海。《东征传》的作者说他“江淮之间，独为化主”，的确是名副其实的。

驻锡扬州期间，鉴真除讲授佛学，超度生灵之外，还从事了大量与佛教事业有关的社会活动。据《东征传》的记载，他曾筹款并亲自规划、主持营造了 80 多处寺院，“供养十方僧众”，指导塑造、绘制了大量的佛像和壁画；设立了赈济贫苦的“悲田”，以救济贫病；抄写了《一切经》(即《大藏经》)3 部，凡 3 万 3 千余卷。他的这一系列活动，在僧俗各界都产生了广泛的

影响。

3. 结缘东邻

日本留学僧荣睿和普照一行，之所以千里迢迢，来到大明寺，拜谒鉴真和尚，除了他们仰慕鉴真的大名之外，还因为他们留学大唐时，日本政府曾交给他们一项特殊的使命。

当人类历史进入七世纪时，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耸立起一个举世瞩目的强盛帝国——大唐帝国。以强盛、文明和开放为核心内容的“盛唐气象”，不仅吸引着世界各大洲的众多国家和民族，而且更是强烈地吸引着与中国一海之隔的近邻——日本。故而，自东汉开始就有了官方正式交往的中国和日本，到了唐朝，更是进入了两国关系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代。

七世纪中叶，在圣德太子执掌国政期间，日本实行了其开国史上首次重大社会变革——“大化革新”。在这一社会改革过程中，由唐归国的留学生高向玄理和学问僧旻，是革新政治的实际决策者和主要设计师。他们系统地参照唐朝的制度，制定了一整套的改革方案。在“大化革新”之后，大唐文明的优越性，受到日本朝野的异常重视。“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日本书纪》推古天皇三十一年），成为日本各界有识之士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一股系统地学习和引进中国优秀文化的热潮，蔚然形成。

据日本中日关系史专家木宫泰彦的研究，在唐代，日本政府曾先后派出19次“遣唐使”（《日中文化交流史·隋唐篇》），其中因故有6次未能成行。每次派出的遣唐使团中，一般都有2百多人，最多的一次竟达651人。伴随着“遣唐使”的到来，

大批日本的政界人士、留学生和留学僧等,纷纷来到中国。他们大到唐朝的立国体制、政宪律令,小到中国的民间杂艺、风俗习惯,无所不学。这些人学成归国后,把优秀的中国文化带到自己的祖国,从而在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民俗风情、宗教文化等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木宫泰彦认为,“日本中古之制度,人皆以为多系日本自创。然一检唐使,则多知模仿唐制也”(《中日交通史》),这一论断,是十分中肯的。

在唐朝绚丽灿烂的文化,被系统介绍、引进到日本的这一大潮中,唐代的佛教也成为日本学习、采用的重要内容之一。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之后,经过魏晋南北朝数百年间的发展,在中国社会各阶层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到了隋代,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进一步促进了佛教的传播。“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叫任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佛像,而京寺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隋书·经籍志》)。历史发展到唐代,中国的佛教更是宗派林立,高才辈出。特别是玄奘法师自印度带回大量佛学经典之后,佛教各派在自身佛理法义的建设方面,都日趋严整和深邃。不论是在教规戒律、僧籍管理方面,还是在佛教哲学方面,抑或是在与佛事有关的雕塑、绘画、建筑等佛教艺术方面,唐代的佛教文化都进入了最高的境界。

与中国上述情况不同的是,佛教自6世纪通过中国和朝鲜传入日本后,在发展、普及的过程中,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首先,在中国很早就形成了一整套的僧籍管理制度,一个人要想出家并取得僧籍,必须遵照严格的受戒制度,在三师七证临席的情况下,举行授受仪式,才能承认其僧籍,再由国

家授予度牒，作为出家的凭证。即使是在僻远的地方，至少也得有 5 位享有一定威望的和尚临席，否则，就无法取得僧籍和度牒。若是受戒之后，没有取得度牒，只能算是“地下僧籍”。这对控制僧侣的人数、提高僧侣的整体素质，无疑是大有作用的。然而，在日本，这种严格的受戒制度一直没有确立，许多下层群众为逃避繁重的赋役，纷纷自度、私度，致使佛门人满为患，国家税收大为减少，直接威胁到朝廷的财政来源。其次，在中国的佛教界，教规戒律，一向严密，一个人在取得僧籍后，必须以戒律为规范，“若有不持者，不齿于僧中”（《东征传》），从而僧纲严正，佛门清明。然而，当时日本的情况却正好相反。日本史书在记述当时佛教界的混乱情况时曾写到：“近在京僧尼，以浅识轻智，巧说罪福之因果；不练戒律，诈诱都里之众庶”（《续日本纪》养老六年七月己卯）。在京的僧尼尚且如此，其他地方也就可以想见了。

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外来一切优秀文化的民族。为了改变当时佛教界存在的严重混乱状况，日本政府先后派出大量的留学僧，到唐朝佛法兴隆的长安、洛阳、扬州等地的名寺，投拜高僧名师。据木宫泰彦的研究，在唐代，日本共派出留学僧 116 名，占当时日本在唐留学人员总数的 78%。他们在学成归国后，对日本佛教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除了派出去，还要请进来。当时，在日本元兴寺，有一位高僧隆尊。面对佛教界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这位有识之士十分焦虑。他认为，日本佛教界之所以僧纲不正，佛门人满为患，主要是因为缺乏一套受戒制度，而要建立受戒制度，又必须要有精通律学的高僧。为此，他请求政府尽快派人到中国去延请名

师，前来设坛授戒，宣扬律学，整肃僧风。他的请求很快得到政府的批准。日本天平五年(733)，兴福寺的荣誉和大安寺的普照，带着礼聘中国高僧“东游兴化”的使命，随第九次遣唐使，渡海来到中国。而鉴真正是他们完成这一使命的最后一线希望。

4. 慨赴东瀛

荣誉和普照来到唐朝的那年，鉴真已经46岁了。此时的鉴真，在佛教界已享有崇高的威望；特别是在江淮之间，他更是“道俗归心，被仰为受戒大师”。这种情况，负有特殊使命而来到中国的荣誉和普照当然是知道的。只是，当时鉴真在扬州，而荣誉和普照却只能在洛阳一带活动，因而一直没有机会当面邀请鉴真赴日。根据唐朝的制度，日本留学僧来到中国后，要由中国政府作统一管理。唐朝主管留学生的政府机构，前后有所不同。先是祠部，后是左右街功德使，最后则是鸿胪寺。政府主管机构将留学僧分配到有关地方时，还规定了留学僧居住的寺院和活动范围，要离开原来的居住地，必须先得到当地政府的许可，并给予“公验”(即通行证)，否则，禁止走动。只有在取得中国僧籍后，留学僧才可以在中国各地自由往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行》)。荣誉和普照来到中国后，被主管机构分配到洛阳的福先寺。他们初来乍到，不可能马上取得中国的僧籍，因而也就没有机会前往扬州，拜谒鉴真，并见机邀请他东渡弘法。

自开元二十二年(734)11月起，日本第九次“遣唐使”船便陆续回国。但荣誉和普照二人并没有随船返回，而是留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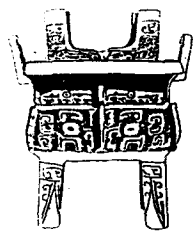
国。个中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一直没有物色到最佳人选。这期间，他们曾邀请到洛阳大福先寺的道璇律师，只是道璇来到日本后，虽“讲敷历藏”，初步地传播了律宗的学理；但一直因“僧众不足，不能秉行结界登坛受具戒法”（《三国佛法传诵缘起》）。也就是说，延请名师以设坛授戒，建立完备的受戒制度这一使命，并没有因道璇的赴日而完成。

好在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经过10年的留学经历，荣睿和普照不仅结交了中国佛学界的各派名师，而且还取得了中国的僧籍。因为，按照唐朝政府的规定，“新罗、日本僧入朝学问，九年不还者，编诸籍”（《唐会要》卷四十九）。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南下扬州，面请鉴真东渡的机会，终于来临了。

机会是有了，但鉴真是否愿意东渡呢？这一点，荣睿和普照两人是心中无底的。首先，鉴真是一位名震全国的高僧，在律宗一派，更是一代宗师，在佛教徒看来，正所谓功德圆满，未必肯轻易远渡。再者，从中国渡海到日本，路途遥远，惊涛骇浪，九死一生，没有勇气、毅力和献身佛法的精神，是不可想象的，更何况此时的鉴真，已有五十五岁的高龄。故而，在南下扬州之前，荣睿和普照就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先邀请鉴真的弟子，即大安寺的道航，以便来到扬州后，由道航作些劝请鉴真的工作；另一方面，又邀请了长安僧澄观，洛阳僧德清，以及朝鲜籍僧如海，以防万一鉴真不愿意东渡，也好请他们一行赴日，这样也可以向日本的有关方面交差了。在作好这两手准备之后，他们便直奔扬州而来。于是，便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出乎荣睿和普照二人意外的是，当他们说明来意之后，鉴真便慨然应允，答应前往日本，兴隆佛法，普渡众生。荣睿、普

照听罢，感动万分，欣幸万里来华，十年沧桑，如今夙愿终获实现。



二、披艰辛师徒五遇险 历磨难大师双目盲

1. 后院起火

经过几个月的积极准备，到荣睿、普照赴扬州礼聘鉴真的次年(743)春天，航海的船舶已经造好，随行人员的干粮等物，也一应备齐。在鉴真献身佛法，立志东渡的精神感召下，他的弟子中也有不少人表示愿意随师而去，他们是道兴、神顶、崇忍、灵粲、曜祭、明烈、道默、道因、法藏、法载、昙静、道巽^①、幽严、思托和祥彦等 17 人。在鉴真师徒之外，还有随荣睿、普照同来扬州的道航、澄观、德清、如海，以及日本留学僧玄朗、玄

① 道巽，据汪向荣校注《唐大和尚东征传》本。亦有作道异、道翼等。